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精品文库



文化与形象——日本学研究前沿

文化と形象——日本学研究の新動向



吴光辉◎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非外借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精品文库



文化与形象——日本学研究前沿

文化と形象—日本学研究の新動向



吴光辉◎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形象:日本学研究前沿/吴光辉著. —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9.12
ISBN 978-7-5615-3686-5

I. ①文… II. ①吴… III. ①日本—研究 IV. ①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75215 号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王扬帆
封面设计 李夏凌
技术编辑 许克华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机 0592-2181111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720 mm×1 000 mm 1/16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82 千字
版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前 言

究竟何谓“进步”？在历史即将踏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时候，我们禁不住要思索这一问题。历史上，日本哲学家九鬼周造（1888—1941）曾在《柏格森在日本》一文之中提到这么一段话：

所谓进步，不管如何理解它，我认为必须与传统坚定地结合在一起加以思索。述说进步，依照这一概念本身，也就是述说传统。我们东方思想确实需要学习西方思想，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丰富我们固有的传统，那么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进步。因此，我们为了超越我们固有的传统，就必须依循于固有的传统。为了追赶超越，而必须回归过去，探索遗迹。

在这样一段话之中，我们或许可以领略到所谓“进步”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涵。首先，如果说“进步”只是超越他人，而不是超越自我的话，那么，这样的“进步”也就不具备真正的价值。因此，所谓“进步”，首先必须是针对自我的，且是针对过去的自我的一种超越，也就是针对传统的一大超越。

其次，首先如何把握西方，如何把握东方，我们借助西方来审视东方，审视传统，在这样的外部标准下，我们或许可以一下子就功利性地提出所谓精华或者糟粕的二分法，但是这样的标准并非是以我们自身的传统为标准而确定下来的。因此，只有将西方作为一面镜子，而不是绝对的标准，由此来反观我们自身，进而回归到

传统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地把握何为传统。

最后,或许我们难以认同九鬼周造“依循于固有的传统”的提法,但是,为了追赶超越,我们必须回到传统,回到历史之中。所谓“进步”,事实上不是一个时间范畴,而更应该是一个当下的历史审视、当下的历史反思。唯有确认了传统的存在,领略了镜子的工具价值,我们才能真正地超越它,实现真正的进步。

回想迄今的学术生涯,我也会时不时地回归到历史的语境下去把握历史的真相,尝试展开历史的批评。但是,历史始终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让我不得不产生敬畏之心。就本书的框架结构而言,可谓是最为深刻地体现出了我的这样一种敬畏。

本书选择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就是作为历史传统的科举制度。回想起来,我学生时代最初提出的学术报告之一,就是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撰写的一篇讨论科举制度的小论文。该论文选择了日本著名学者、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的《科举史》一书,探究了在清末时期西学东渐的时代语境下关于科举评价的“悖论”,得到了东京大学教授、指导教师之一的平川祐弘先生的指点。五年之后,我得以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攻读日本哲学史博士课程,得以完整地阅读宫崎市定的著作。十年之后,我进入了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科举学创始人刘海峰教授门下系统学习科举史,亦发现了不少新奇的史料,从而撰写了数篇研究论文,参与到如今的科举学研究中。不过,我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却在于:科举制度究竟是如何演绎变迁的?科举制度到了清末何以遭至恶评?科举制度是否可以代表中国传统?对此,或许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拙论而了解到本人的立场。不过,我亦想阐述一点,即如果说科举制度构筑起了东亚传统的一大共性,科举文化圈构筑起了东亚传统的一个价值标准的话,那么我们不仅不应该犹如过去一般嘲笑科举、讽喻科举,反而要通过探究科举制度的存在遗迹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抑或是在韩国,由此来理清我们真正的传统的脉络。

本书选择的第二个研究对象,就是如何把握日本文化,如何把握日本文化的大方向。日本神道理论的依据究竟何在?大多数学者采取了系统论的方式,去追溯日本自身的根源,且只是日本自身的根源,但是,这样的追溯离不开中国,也不可以离开中国。日本若是回归传统,则必然会指向中国。不过,以近世日本为例,学界

大多采取了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框架来排斥中国,采取了知识与审美的二元对立框架来突出审美,这样一来不仅使所谓的日本传统失去了自身的本来面目,还过于狭隘地规划出了一条缺乏知性、缺失理性的“唯美主义”道路,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缺失。

作为日本文化的根源之所在,本书提到了中国的朱子学、日本的武士道。本书收录了日本神道文化、武士道,中国朱子学,中国形象研究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日本文化反复走过了一条接受朱子学、转向武士道的道路。不可否认,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历史事实,近代以来的中国与日本的文化思想的研究,大多呈现为这样的一系列研究主题。不过,作为历史研究的细部问题,这样一个自外部到内部、自他者到自我的过程绝不是那么单纯,也绝不是那么直接的。就在日本选择中国文化作为工具来加以吸收并建立起所谓的自我的同时,中国文化被日本逐渐消化,进而被日本否定,这也就是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形象”所反映出来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本书选择的第三个对象,就是中国形象的问题。所谓中国形象,就是日本的中国形象。这一研究的对象不是中国是什么,而是作为修饰语的日本,换言之,“日本的中国形象”研究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不仅如此,这一研究也不只是针对中国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中国将走向何处、如何与中国交往的问题,而且,较之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中国将走向何处、如何与中国交往这样的问题日趋重要,也左右了当下的日本外交政策乃至民间交流。

不可否认,本书不管是研究朱子学还是研究武士道,皆采取了这样的“形象学”研究的套路。换言之,不是去深究朱子学之理,探讨武士道之道,而是站在它是如何呈现出来的立场来加以审视,加以批判。或许这样我们也就具有了直接的批判的可能性。事实上,围绕朱子学之理、武士道之道,我们不无遗憾地指出,这样的原理性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拓展,随着民众思想意识的不断进步,也走向了一个纯粹思辨的范畴之中。或许,采取形象学研究的态度去加以认识、怀疑、审视、批判,进而梳理出传统价值与现代意义,才是我们未来可以走的一条道路。

作为赘述,本书收录了两篇附录,涉及如今最为流行的汉学研究。之所以收录这两篇书评,一个是为了推介香港学者吴伟明教授,尤其是他始终从事的易经研究;一个是为了回应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陶教授推出了极为重要的“文化交涉学”

的理论,并由此来研究近代日本的中国学的萌芽与展开的问题。不言而喻,我自身也期待这样的学问可以不断拓展,成为未来日本学研究、东方学研究的一大亮点。

本书之所以选择“日本学研究的前沿”这样的题目,并不是在于这样的研究成为或者将会成为日本学研究的前沿,而是试图站在前沿研究的一个视角,颠覆过去的持说固论,重新梳理东亚的传统,由此而尝试提出一点新的路径或者方法。因此,本书的编辑不过是一个尝试,希望就此可以获得批评与建言,以期将来可以深省与慎行。

吴光辉

海韵北区公寓

2019年10月13日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的科举研究——“科举学”的外部视角	1
第一节 日本科举研究的渊源	2
第二节 日本科举研究的内涵	6
结论	10
第二章 文明转型与科举评价	13
第一节 赞美与援用：传统复兴观念下的科举评价	14
第二节 禁锢与枷锁：近代文明背景下的科举考察	16
第三节 反思与还原：中国文明的重新认识	19
结论	23
第三章 日本“科举学”的转型与评价——以江户时代的《对策则》为中心	25
第一节 《对策则》的成书缘由	26
第二节 多重视野下的“学问吟味”的批评与思索	30
第三节 重新评价《对策则》的文献学意义	34
第四章 “世界史”视野下的书院·书院文化·书院精神	38
第一节 作为“广义概念”的书院	39
第二节 作为“东亚文化”的书院文化	41
第三节 作为“世界史”意义的书院精神	46
结论	49

第五章 日本神道理论依据的文化论思考	51
第一节 作为日本文化论的神道	52
第二节 近世初期日本神道的展开	53
第三节 近世神道与日本文化论的思考	56
结论	58
第六章 江户时代朱子学的表象与位相	59
第一节 作为“实理之学”的朱子学	59
第二节 作为“真儒之学”的朱子学	62
第三节 作为“正统之学”的朱子学	65
结论	68
第七章 外部视野下的“武士道”	69
第一节 周作人的日本论	70
第二节 武士道是什么	73
第三节 作为比较文化论的武士道	78
结论	82
第八章 近代以来日本视域下的朱子学与中国形象	84
第一节 “自我·他者”的框架下的朱子学	84
第二节 “华夷思想”构建中的朱子学	87
第三节 “文明开化”背景下的朱子学	89
第四节 “传统回归”思潮下的朱子学	92
第五节 “近代国家”观念下的朱子学	95
结论	97
第九章 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近代日本的中国形象之考察	99
第一节 前近代的“文化他者”	100
第二节 作为“恶友”的他者	103
第三节 被奴役的他者	105
第四节 被拯救的他者	108

第五节 被同化的他者	112
第六节 “多元性的他者”的中国形象	115
结论	118
附录1 经典诠释与谱系传承	
——试评吴伟明教授《易学对德川日本的影响》的研究	120
第一节 基本框架与核心内容	121
第二节 问题意识与批评探讨	124
结论	127
附录2 汉学革新与文化交涉	
——陶德民教授《近代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开端》之述评	129
第一节 该书的研究框架	130
第二节 该书的核心内容	132
第三节 基本问题和反思批评	135
结论	137

第一章

日本的科举研究——“科举学”的外部视角

1905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废除了历经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曾经长期为日本、朝鲜、越南仿行实施，从而形成东亚考试文化共同圈的科举制，曾经受到数个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的高度赞赏，引以为鉴而建立了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科举制，就此走向寿终正寝。^①历史由此过去了一百多年，世纪回眸，再度审视，科举制的革废所带来的批评、思索与质疑，可谓是此起彼伏，令人回味不已。

作为科举研究的外部视角，日本曾经一度仿行科举制度，建立了自身的“贡举制”；而后，到了近代化的前夜，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江户版”科举制；即便是到了明治维新初期，为了选拔人才，日本也曾出现“进士及第之法”的提案。也就是在日本，到了战后，开始出现一批以中国科举制为对象的研究著作，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科举学”。在此，本论将立足“科举学”的外部视角，通过阐述日本科举研究的文化渊源、基本内涵与研究意义，来探究“科举学”作为一门国际性学问的定位，并进而挖掘外部的视野，即日本的科举研究为“科举学”的树立所带来的借鉴与启迪。

^① 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第一节 日本科举研究的渊源

日本的科举研究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日本开始步入近代化的明治时代初期。为了选拔人才，推动维新运动，兰学者神田孝平向太政官咨询机构——公议所提出了“进士及第之法”的提案。这一提案的目的是以“汉土及第法”，即中国的科举考试为参考，试图建立近代日本的文官考试制度。^① 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之初，日本政府聘请的美国学者戴维特·莫奈尔为其首批毕业生进行了一场教育制度的演讲。戴维特·莫奈尔回顾了东方考试制度，即科举制度的历史，指出：它乃是一个“极为盛大之要具”^②，以“革新国家”为目标的近代日本若是能将之灵活发挥的话，必然对自身的近代教育体制产生积极影响。

这样的认识，或许不会成为推动日本近代言官考试制度得以建立的主导力量，但至少会令日本人关注到东方文化自身也存在令西方人敬佩不已的优越制度。不过，历史的车轮并没有直接地走向复古主义，随着日本近代国力的上升与侵略野心的膨胀，日本开始走向鄙视亚洲，走上了“脱亚入欧”的西方文明一元化的近代化道路。^③ 作为封建官僚制度有效支撑的科举制度，并没有得到日本人的赏识与采用。到了甲午战争之后，科举制更是被冠以禁锢民众思想、阻碍社会进化之名，成为一个被深刻批判的对象。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近代的基点，日本的科举研究开始起步。

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东亚的科举制度？开启近代科举研究之先河的，乃是曾经留学德国、英国、美国，而后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原胜郎（1871—1924）。

① 天野郁夫：『試験の社会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56～59頁。

② 天野郁夫：『試験の社会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2～3頁。

③ 吴怀中：《“文明史观”在近代日本对华认识及关系中的影响》，载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本学研究》卷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

作为一名研究西方史的学者^①，原胜郎深刻了解西方学术界对于科举制度的高度评价，20世纪初曾到中国参观南京贡院，并写下了《贡院之春》一文。这篇随笔开篇提到，“人曰中国衰微之根源乃科举也，呜呼科举果其罪乎？”即为近代以来饱受批判的科举制度正名。接下来，针对人们批判科举制度乃是“殃国”之制，乃是清朝衰败之主因的言论，他认为：任用官吏应以公平为第一义，最要注重自由竞争。英国不过是1870年之后，美国不过是1883年之后才推行文官考试制度，而中国千余年来进行科举考试，历朝逐次加以改良，决非可以嗤笑之物。而且，就通过公开考试广泛选拔人才而言，中国文明可以说远远领先欧美各国。因此，科举制度造就了中国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顶峰。如果将中国的衰败归结于科举制度，那么没有科举考试的中国或许早在数个世纪之前就走上穷途末路。

针对人们批判科举考试不切实际，未尝推进经世有用之学，注重诗文，拘泥八股的言论，他认为：考试科目的问题不过是细枝末节而已，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锁国政策。若是中国自主地开放门户，维持公平的人才录用制度，也就是说中国如果时刻地保持与世界同步，注重人才选拔之公正性的话，那么考试科目这一问题自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进。不仅如此，原胜郎还指出：文官选拔的必要条件在于深厚的常识、明晰的理解力、绅士的修养三大要素，而1876年英国高等文官考试的科目并没有体现这一精神，相反，中国科举考试之中的经学、诗文、策问的考试方式，正足以满足文官选拔的基本要求。总之，他认为：“科举未必是必须一概加以否定的恶制，反而存在足以令人大为称颂之处。”中国社会的停滞，并不在于“科举”，而是中国文明早在数个世纪之前即已经达到了发达的顶峰。之所以衰败，不过是“其命数穷也”。^②

就科举制度的评价而言，原胜郎的论断可谓是深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社会进化论与20世纪的文明观的影响。首先，他没有将科举制度与中国社会的停滞联系起来，而且对科举制度造就中国文明的历史功绩进行了正面的肯定；其次，站在近代化的立场，他没有一味地否定科举考试的功能性，而是将中国“后发外生型”的近代化过程归结为体制改革的问题；最后，结合近代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他高度评价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与全面性。

① 李文英：《模仿、自立与创新——近代日本学习欧美教育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8页。

② 宫崎市定：『科举史』，东京：平凡社，1987年，第317～321页。

总之，原胜郎的这一评价，足以媲美梁启超的“夫科举，非恶制也”。^①它不仅为后世的科举研究奠定了一个公正评价的基础，同时也提示世人，东方文明的传统之中亦存在足以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的文化因子。

继承原胜郎之科举评价的研究者，也是世界性的科举研究者的代表人物，即原胜郎的弟子、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1901—1995）。1946年，宫崎市定出版了《科举》（秋田屋出版社）一书，这是日本近代以来第一部以科举为主题的著作。这部著作的出版主旨，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于挽救日本二战以来的“中国学的贫困”。^②战争结束之后，宫崎市定于1956年出版了《九品官人法研究》，并为兼顾与《科举》之研究的连续性，附加了“科举前史”的副题。而且，宫崎市定一改《科举》一书所论述的科举考试制度起源于隋文帝开皇三年至十五年之间的旧说，力主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1963年，宫崎市定出版《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一书，1987年，他又将早年的《科举》一书改名为《科举史》，经平凡社东洋文库出版。这样一来，即形成了《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科举史》的系列研究，从而成为世界科举研究的代表人物。

宫崎市定是日本东洋史学的标志性人物，是日本“京都学派”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创立者。自开始科举研究以来，宫崎市定选择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不断地论证科举学的起源、成立与发展过程。《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以汉朝至唐朝的官僚制度的形成为主线，着重南北朝时期的官僚体制与选举制度，力主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体制的演变核心在于自贵族制向官僚制过渡，从而为科举制的全面实施奠定了一个政治基础。《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一书则一改历史性的叙述方式，以学校试（县试、府试、院试、岁试）、科举试（科试、乡试覆试、举人覆试、会试、会试覆试、殿试）、朝考、武科举、制科为标题，纵览科举考试的整个过程，深刻描绘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地狱”。1987年改版的《科举史》一书，以科举的沿革、清代科举制度、近世中国社会与科举、科举制度的崩溃为各章标题，进一步拓展社会阶层、官僚生活、学问知识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关系，实现了自身的研究视角的过渡，即从官僚制度史、科举专门史走向科举社会史。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 官制与官规》，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8页。

② 宫崎市定：『科举史』，东京：平凡社，1987年，第323页。

1976年，宫崎市定的《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一书经美国人 Conrad Schirokauer 之手，以“China's Examination Hell—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Imperial China”为名，通过 Weather Hill 出版社出版。尔后的1981年，耶鲁大学出版了普及本。这部译著得到了以《时代文学周报》为代表的美国学术杂志的关注，为宫崎市定赢得了巨大的世界声誉。《时代文学周报》评价指出：“本书深刻而鲜明地描绘了进入中国科举之路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对于试图了解中国帝政时代科举制度森罗万象的样态的人而言，可谓是最为实用的文献。”^① 不过，宫崎市定也丝毫没有避讳，而是逐一列举了美国媒体对他的批评，即宫崎市定的科举研究欠缺文学与哲学的研究视角，科举制度是否足以成为一个促进社会走向成功的有效手段？是否完全是以中国的儒教主义为基础？不过，通过“考试地狱”一词，我们也可以洞察到宫崎市定针对日本社会的考试之风而深入研究科举制度的现代性视角。

宫崎市定的科举研究三部曲，构筑了日本科举研究的顶峰。不过，美国媒体对此进行的批评，也成为后继的日本科举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契机。继194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登科记考·唐尚书省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历台精舍题名考——索引第一》与《登科记考补——索引第二》之后，佐伯富编撰《宋史选举志索引》（同朋社，1982年），中岛敏编撰《宋史选举志译注》（东洋文库，1992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撰《明登科录索引稿》（明末清初社会文化研究组，1995年），进一步加强了实证性的考据研究。与宫崎市定的科举研究同步，荒木敏一的《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9年）、村上哲见的《科举史话：考试制度与文人官僚》（讲谈社，1980年）相继出版。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岛敏得到文部省的科研赞助，提出《宋代至明、清时代科举、官僚制度及其社会基础》（1992年）的研究报告，平田茂树出版《科举制与官僚制》（山川出版社，1997年），大修馆书店发行的《中国》杂志出版了科举研究的特集。不仅如此，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也被翻译为日文，先后得以出版。根据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的收集与整理，到2000年为止的日本科举研究著作与独立论文达到了百余部（篇），标志着日本的科举研究进入到一个具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的新

① 宫崎市定：『科举——中国の試験地獄』，東京：中央公論社，1984年版，第251頁。

时期。

这一时期，平田茂树的《科举制与官僚制》一书可以说为科举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承袭近代以来科举研究的成果，平田茂树首先指出科举制度的第一定位，无疑在于“作为考试制度的科举”。针对宫崎市定理念化地将科举制度的实施解释为世袭贵族制与文人官僚制度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结果这一论断，平田茂树认为科举制度亦为贵族所加以利用，唐朝前期的科举制度本身或许也可以说是为了“贵族”而加以设置的选拔制度。其次，他明确提出了作为“系统”的科举这一视角，指出它是构建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之构造的基石。借助美国政治学者梅里阿姆的“Political Power”（政治权利）理论，他指出科举制度作为一个信息操作系统确立了古代文人官僚政治的合法性；借助法国社会学者布鲁杜的“文化资本”理论，他指出科举制度是一个再生产系统，即特定的文人阶层通过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而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的人文社会。也就是说，科举制不再是一个从属于政治学的人才选拔制度，而是一个居于核心地位，发挥能动机能的主体性存在。^①

平田茂树的《科举制与官僚制》一书，并没有就科举制度的双重特性，即考试制度与再生产系统进行深入的实质性的研究，不过，它的目的方面在于试图弥补传统以来的官僚制度研究视角的缺憾，另一方面则仿佛是潜在解答美国学者针对宫崎市定之科举研究所提出的质疑。而且，这一研究的视角也突破了传统的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在以科举制度为主体的前提下，开展科举政治、科举社会、科举文化一类的多学科研究。无疑，对于21世纪的科举学研究而言，这样的一个认识视角与理论基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应该说将会极大地拓展科举研究的空间与深度。

第二节 日本科举研究的内涵

就日本科举研究的历史渊源而言，大概可以说走过了三个阶段。首先，原胜

① 平田茂樹：『科举制と官僚制』，東京：山川出版社，1997年，第6～15頁。

郎是站在东西文明对比的框架内，否定明治时代的一元化文明史观，承认东方文化也具备了自身的价值，其最大的功绩是为公正评价科举制度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言论。其次，宫崎市定的科举研究深入到科举考试的内部，广泛涉及中国人文社会的各个层面，注重资料的原始性与广泛性，采取历史性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科举研究的拓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而且，宫崎市定的科举研究可谓带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一是为了挽救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的贫困；其二是针对日本“考试战争”的时弊。这样的立场，无疑带有了反思近代化的内涵。最后，以平田茂树为代表，日本的科举研究者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进一步开展文献研究；另一方面也开始突破历史学的框架，借助西方的政治学或文化学的核心概念，将科举学推广到一个研究主体的地位。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演变历程，也为 21 世纪建立“科举学”奠定了一个理论的基础。

那么，日本的科举研究究竟注重到了科举制度的什么问题呢？在此，结合日本科举研究的特征，简要加以归纳与评价。

（一）科举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承前所述，宫崎市定于 1956 年出版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中，力主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 年）。但是，无论是荒木敏一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还是村上哲见的《科举史话：考试制度与文人官僚》，抑或是平田茂树的《科举制与官僚制》，皆只是阐述了中正制度与科举制度之间的连续性，而没有直接言明宫崎市定的这一论断。或许，日本的科举研究者对此心存怀疑，却无法提出更为确切的文献资料，所以刻意回避了这一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台湾学者高明士教授认为开皇七年虽然建立了科目制度，但是并没有设立进士一科。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证与辨析，指出广义的科举是指分科举人，起始于汉代；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它并非是始于开皇年间，而是隋炀帝大业元年，^①从而解决了这一持久的悬案。

（二）科举制度的公平问题

宫崎市定指出：科举制度的实施目的在于遏制贵族势力，公开选拔人才，统一中央集权。作为一个文官考试制度，它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而产生，并

^① 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年，第 61 页。